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 关键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大熔炉”

□ 孙玉华

“大熔炉”比喻能使人饱经锻炼、广积经验、提升素质与能力的平台、场所或环境。广大青年成长成才，党员干部增强党性，都需要经过“大熔炉”的历练、磨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熔炉”的重要论述，为广大青年和党员干部的成长锻炼指明了方向。

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强调，广大青年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熔炉中，在社会的大学校园里，掌握真才实学，增益其所不能，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一代的理想与担当，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党和人民事业的成就离不开青年的付出与贡献。新时代新征程新目标，需要青年继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坚持“三个面向”，深入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广大青年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抓住火热的青春年华，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努力开阔视野，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基层一线，勤学苦练，增长才干，提升能力，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勇担时代重任。

2013年6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要围绕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任务，激发广大青年在基层实践大熔炉贡献聪明才智、书写青春篇章。中国共产党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素有“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优良传统。共青团组织要把握住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广大青年的脉搏，激励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立足基层实践，脚

踏实地，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规划和实现自我人生目标与价值。基层实践是丰富多彩的、生动鲜活的，既有一帆风顺的坦途，也有坎坷与挑战的曲折。团组织要引导并激励广大青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经历风雨、磨炼意志，在锻炼中成长，把理想信念和报国之志转化为立足岗位作出贡献、服务社会的实际行动。

2015年7月6日至7日，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群团机关干部，总体上应该有基层工作经历，要注重在基层一线锻炼培养，要真正在大熔炉里炼就。群团机关干部的工作对象是相关领域的广大群众，主要开展群众工作。群团干部需要基层一线实践岗位的群众工作经历。社会基层的群众工作，往往因为条件艰苦、路途较远、情况复杂、困难集中等因素，能够考验、锻炼、培养群团机关干部。经过基层实践历练，群团干部更能了解社情民意，了解群众疾苦，更懂得如何真抓实干，磨砺了品格、锻炼了意志、增长了才能。基层一线的锻炼和培养，有利于群团干部提高对群众工作复杂性艰巨性的认识，积累群众工作的经验，深入把握党的群团工作规律，提高党的群团工作科学化水平，使他们较快地成长为党的宗旨的忠实践行者、群众路线的坚定执行者、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

2016年10月24日至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部党内法规。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广大党

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一个党员的党性，不是随着党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自然提高的，不加强修养和锤炼，党性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甚至可能完全丧失。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和主观世界改造，是一个需要终身不懈努力的过程。加强党性修养、锤炼党性的平台、载体，就成了关键。若是这些缺失，增强党性就成了空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提供了制度保障。准则规定了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十二条规范，既是锤炼党性的平台、载体，也是锤炼党性的重要遵循。我们把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通过理论武装、整饬作风、严明纪律、从严治吏、惩治腐败等举措，有效解决了党内存在的许多突出问题，党风政风焕然一新。

2016年12月7日至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学校教育、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就是说高校要成为锻造优秀青年的大熔炉。我国高等院校一直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层次人才。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适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和任务强烈呼唤新的科学知识和更多的卓越人才。新时代的高校必须围绕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争创世界一流高校或学科，培养出世界一流人才。我国高等教育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过程中肩负重大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就是要坚持“马院姓马，在马言马”的鲜明导向和办学原则，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马克思主义进校园、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发挥应有作用。

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学院主阵地属性。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一次次取得伟大胜利的成功奥秘。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当代中国阐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平台，对于推动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塑造和凝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导大学生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

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充分证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践形成的伟大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充分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如何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要，而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基础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学院主阵地作用

□ 宋伟

性、战略性作用，是新时代必须建设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宣传主阵地、主渠道。

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学院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中共中央专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教学和研究作为引领中之重，进一步明确职责使命，推动内涵式发展。这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提供了行动纲领和目標指南。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定位，推动学科建设实现内涵式发展，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着力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进一步提升思政课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充分实现思政课在政治引导、学理阐释和价值塑造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注重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的同频共振，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全面融入到各门课程，形成“大思政课”新格局。打造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的使命感、认同感、获得感，充分发挥教师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作用。聚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人才培养，构建具有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全面加强党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是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我们推进各方面制度建设、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加强和改进各方面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自觉贯彻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要求。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 and 统筹作用，把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学院各项工作创新发展。这不仅是保证马克思主义学院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行的根本基础，也是发挥马克思主义学

院主阵地作用的重要保障。加强党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全面领导，要进一步发挥党委在各项决策中的主导作用，推进党委扛起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主体责任，推动形成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科学政策机制，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引领航程。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

□ 张琳

把握住了以上时代精神，抒发了时代青年的苦闷心声，才赢得了大众，特别是青年人的认可。

与此同时，闻一多又特别指出《女神》地方色彩缺乏，并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分析指出其缺乏的表现和原因。在闻一多看来，“现在的一般新诗人——新是作时髦的新——似乎有一种欧化的狂癖，他们创造中国新诗的鹄的，原来就是要把新诗作成完全的西文诗。”在他看来，作为新诗代表作的《女神》，其欧化的表现于，一是诗中所用的典故，西方的比中国的多多了，二是诗中夹用了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究其原因，作者创作时的环境——日本，正是一个盲从欧化的日本，而且他读的书又是西洋的书；此外，最根本的还是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之隔膜。

为此，他强调中国的新诗，“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也不要人们误会“是翻译的西洋诗”。他还针对当时对所谓“新”的就是西方的，这一普遍存在的偏狭的理解，一针见血地指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根本原因在对于新诗意义的理解差别问题。在闻一多看来，新诗当然是新的，但这种“新”，“不但新于中国古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它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二

闻一多对时代之精神和文化使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乃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在保持原典精神的基础上，从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理论风貌诸方面追求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闻一多所著的《唐诗杂论 诗与批评》对郭沫若所著的《女神》进行了评论，其中的一些思想和提法，对我们思考这一问题仍有启发。

一

闻一多一方面积极肯定郭沫若的诗是新诗的代表，是“时代的肖子”，把握住了时代之精神，喊出了青年人的心声。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女神》地方色彩之缺乏，“不独形式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闻一多在这里提出了如何对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中，闻一多详细分析了郭沫若的诗时代精神之体现：一是动的精神。“这种动的本能是近代文明一切的事业之母，是近代文明之细胞核。”二是反抗和革命的精神。“二十世纪是个反抗的世纪，‘自由’的伸张给了我们一个对待权威的利器，因此革命流血成了现代文明的一个特色了。”三是崇尚科学的精神。《女神》中所运用之科学知识，不仅见于形式上的，而那“讴歌机械的地方，更当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四是世界主义的精神。“科学的发达使交通的器械将全世界人类的相互关系捆得更紧了。因而有史以来世界之大同的色彩，没有像今日这样鲜明的。”而《女神》所用的方言，所称引的民族，所运用的地名，都不同于旧文学。五是希望的精神。他说：“物质文明的结果便是绝望和消极。然而人类的灵魂究竟没有死，在这绝望与消极之中又时时忘不了种挣扎抖擞的动作。”这挣扎抖擞乃是绝望之下人类的本能和奋力抗争。闻一多认为，正因为郭沫若的诗

的认识与把握，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语境的。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中国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封建旧文化的腐朽性日益暴露。整个社会陷于一种异常严重的文化价值失范境地，知识分子的精神信仰发生严重的危机。呼唤新的文明，成为近代中国在社会与文化理论需求上的迫切主题。而重建中国的文化传统，重建中国的道德价值秩序，从根本上克服中国文化精神的危机，自然也就成了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呼唤中来到中国，它顺应了当时中国历史文化潮流，以其巨大的理论穿透力量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并在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批判与分析中掌握了中国的命运。马克思主义消解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矛盾心理，满足了他们试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救国良方的希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旧知识分子寄望的西方破灭的产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力量，中国的先进分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了胜利。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但不可否认的是，五四以降，在中国文化各领域几乎都存在着话语系统和知识谱系方面的“以西释中”“以西套中”“以西代中”的尴尬状况。闻一多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一员，从诗歌创作的维度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情况，也充分意识和把握到了中国历史文化潮流及其时代主题，他呼吁新

诗人要不忘我们的“今时”同我们的“此地”，这样创造出的作品才既不同于今日以前的旧艺术，又不同于中国以外的洋艺术，才是我们翘望默祷的新艺术。他的呼吁，正是从诗歌创作方面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历史使命和文化任务作出的初步思考和回答。需要指出的是，闻一多1923年提出的对于新诗的理解和创作法，和毛泽东在1964年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可谓不谋而合，如出一辙。不仅如此，他提出的“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话语的建构和转换，同样也具有指导意义和当代价值。

今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也多少存在着话语形态的疏离，即“西洋人说中国话”的情况。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并形成于欧洲工业文明时代，它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也是整个人类文明时代发展过程的产物，在它的体系中容纳了人类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某种相容的一个前提条件。但不可忽视的是，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土壤滋养中产生的，有着自身的文化致思趋向和品性，在马克思经典作家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西方文化基因和启蒙精神。因此，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鲜明的民族特色的过程中，同样有一个话语建构和转换的问题。过去我们在这方面重视和研究不够，这恰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要努力探索

和解决好的历史课题。

有学者认为，现在我们面对的真正问题既不是揪住“中国原创性”的辫子不放，也不是要回到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原点，而是如何去选取其中的合理内核，针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加以创造性的综合、发展与重建。如此，则富有时代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话语将会更具世界眼光、更富现代意识、更有理论活力。

三

一段时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那种总以为“西方的”“新的”就是好的，而缺乏充分的冷静和理性，缺乏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细致地实证调查研究的热忱，因而也就很难使其研究能够充分回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而话语的转变和建构也并不是脱离其内容和现实世界的纯粹话语“转变”。它需要我们顺应时代发展，科学地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重大课题，以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这是话语建构的基础；通过吸收和改造传统哲学，赋予其新的特性，是话语建构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这就需要我们正确看待中西文化，在思想方式上，不能犯形式主义的错误，不能“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该看到它“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

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过时或成为糟粕的东西。”看不到或谰言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的一面，决不是科学的理性的文化自信，而是一种盲目的自大。我们不能把传统文化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不能搞厚古薄今，更不能以古非今。

当然，对于西方文化，我们也有一个科学对待的问题。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外来文化，是对一个国家有无文化自信的考验。唯有自信，才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才能在同外来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得到丰富发展。自觉吸纳、融汇一切外来优秀文化成果，是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的文化不仅面临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特殊问题，而且也面临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如在改造自然、治理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等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认识和思考的过程中，尽管回答的方式和结论具有民族的特征，但其中包含着的某些思想和观点往往超过了时代和民族的局限，具有普遍的意义。

显然，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从理论上都可世界价值体系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只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消除对中国文化之隔膜，积极整理、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并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又对外来文化加强分析、鉴别，择善而从；既加强自身文化的再造吸收能力，又积极把握时代之特点和问题，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